



冷戰與 香港電影

香港電影資料館

冷戰

與

香港電影

目錄

- 5 導論 李培德、黃愛玲

背景

- 13 科大衛：我們在六十年代長大的人
21 周承人：冷戰背景下的香港左派電影
35 張濟順：隔絕中的想像——香港電影與上海基層社會
對西方的反應（五十至六十年代早期）

工業與政治

- 53 吳國坤：冷戰時期香港電影的政治審查
71 黃仁：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的角色和影響
83 李培德：左右可以逢源——冷戰時期的香港電影界

傳媒與文化統戰

- 101 吳詠恩：南來影人與粵語電影評論
111 羅卡：冷戰時代《中國學生周報》的文化角色與新電影文化的衍生
125 容世誠：圍堵頡頏，整合連橫——亞洲出版社／亞洲影業公司初探

大歷史中的小故事

- 145 黃愛玲：從三十年代到冷戰時期——朱石麟和岳楓的電影之路
159 朱順慈：平淡的冷戰——口述歷史中的電影人生
175 鍾寶賢：政治夾縫中的電影業——張善琨與永華、長城及新華

文本分析

- 191 麥浪：冷戰氛圍下的香港寓言——電懋與東寶的「香港」系列
209 韓燕麗：不談政治的政治學——港產倫理親情片試析
221 何思穎：無間諜——香港電影對占士邦熱的回應
231 張建德：聊齋靈異與冷戰電影

附錄

- 249 1950至1970年代香港電影的冷戰因素影人座談會紀錄
263 許敦樂：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意識形態的鬥爭在香港電影的縮影
271 左桂芳：自由總會簡介與大事記

索引

鳴謝

導論

李培德、黃愛玲

冷戰不是新課題，特別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中外研究成果甚多。傳統上，美國對於冷戰研究一直佔著優勢，但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前蘇聯、東歐和國內檔案逐步開放，令冷戰研究日漸國際化，華人學者的參與更變得越來越重要。2006年10月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和香港電影資料館聯合舉辦了「1950至1970年代香港電影的冷戰因素學術研討會」，嘗試從文化、社會角度探索冷戰和本地電影的關係，頗具挑戰性。正如科大衛在主題演講中所說，冷戰可分大冷戰和小冷戰。大冷戰是指美蘇兩國的競爭，也包括意識形態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壘，小冷戰是指國共兩黨在香港的鬥爭。香港過去由於是英屬殖民地，居民以華人為多，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處於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夾縫，華人政治圈內則拉鋸於海峽兩岸政權之間。不過，從此亦可見香港地位的獨特之處。

那麼，在這大小冷戰刀來劍往、暗湧四伏的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是否只擔當了一名荷載獨徬徨的小卒角色呢？恰恰相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退守台灣，兩地都被鎖進意識形態鬥爭的堡壘裡，倒讓我們這塊小小殖民地找到了特殊的生存空間，孕育了生命力旺盛的香港電影。回溯戰前甚至戰後初期的香港電影，一直都是粵語片的天下，偶爾有三數部國語片，不成氣候。戰後，外敵雖已敗退，國共兩黨卻未能相容，爆發激烈內戰，大量人才和資金從上海南下香港，五十年代星馬資金亦大量流來香港，積極介入香港電影業，造就了粵語和國語電影平衡共存的獨特生態，這種局面竟然維持了二十多年，直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粵語影業全面停產為止。這段時期見證了香港電影發展的重要歷史。

如果說香港電影於八十年代開始蜚聲國際，那麼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

又有何特色，如何與八十年代的發展扣上關係呢？在人才培養、市場開拓、資本累積，以至電影類型和風格內容的演變，冷戰時代的香港電影界如何為現在我們所熟悉的港產片創造神話的基石？冷戰對香港電影所產生的影響，或許可用這樣一個淺易的道理來說明：沒有冷戰便沒有邵氏，沒有邵氏便沒有TVB(無綫電視)，沒有TVB便沒有新浪潮電影，沒有新浪潮電影便沒有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的風光。當然，這樣「沒有下去」是沒有意思的，最重要的是要指出冷戰時代香港電影界所發生的事，而這些事對以後的香港電影所造成的影響。

本書各文章的作者，來自不同背景，有歷史學者、文化社會學者、電影研究者和從電影界退下火線的前輩。由於背景相異，在觀點和方法上自然不會一致。不過，從多元角度去討論冷戰時期的香港電影，也就成為本書的特色。通過本書，讀者或可發現電影分析是可以和歷史研究、文化研究、社會研究相結合。過去有人說，做電影史的人分兩類，一類只看電影，不重視文字檔案，一類只重視可靠的文字紀錄，忽略電影本身。其實，兩種方法之間可以互補不足。坦白說，電影研究與電影史研究無大分別，都須面對怎樣駕馭材料和分析文本的問題。除了方法之外，本書的另一特點在於引用不少第一手原材料，包括政府和私人機構的檔案、口述訪問紀錄等。

本書分六大部分，除第五部分外，各收三篇文章。第一部分是本書討論主題的背景。科大衛的文章從生活去告訴我們冷戰的意義，指出香港的左右派之爭只屬於小冷戰，沒有達到「熱」的程度，強調香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於六十年代都有其時代特色，為本書提供了討論的線索。周承人的文章描繪了從新中國成立前到1966年文革爆發前香港左派電影圈，包括長城、鳳凰、新聯三公司的成立過程，並討論內地和香港政府對之態度，提出了左右派陣營劃分的最主要標準，在於國家認同和政治理念的分別。張濟順的文章把討論中心轉移到上海，指出在冷戰初期上海雖然驅除了西方電影的影響，卻無法禁絕大受基層群眾歡迎的香港電影；這裡指的當然是左派公司如長城、鳳凰的出品。根據作者的分析，香港儼然代替了西方的位置，由於受到上海市民歡迎，使有關當局不僅同意引入香港左派電影，更對香港電影界採取積極的統戰政策。

第二部分是冷戰時期的香港電影工業與政治。吳國坤的文章，主要討論戰後香港電影的審查制度和左派電影如何因應電檢制度而作出適當調整，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左派電影並非如我們所想的只會強調意識形態，不講其他內容。相反，左派電影的內容是多樣性的。同時，香港政府對電影的審查亦非一成不變，時鬆時緊，檢查與被檢查之間好像有一種互動關

係。黃仁的文章討論右派電影陣營在香港的發展過程，可謂與前面周承人的文章互相呼應。作者把重點置於電影人和電影機構，指出兩派陣營有過激烈的競爭。在國共鬥爭的前提下，香港影人蒙受了不少損失，不過作者在文章結尾部分補充，香港於冷戰時期的電影對造就八十年代有名的導演有著正面的作用。與黃仁的文章剛相反，李培德提出冷戰時期香港的電影界雖分左右陣營，但之間經常合作，尤以邵氏與長城、鳳凰、新聯三公司的關係最為密切，而影人在兩派之間游走，更非罕見。該文利用有關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的資料，討論 1979 年香港無綫電視演員因赴廣州演出節目，被迫寫悔過書的經過，反映了香港影人處於國共兩黨政權夾縫裡的無奈，這些資料最近由香港電影資料館整理出來。

傳媒乃政治必爭之地，第三部分討論五、六十年代左右兩派如何爭取傳媒陣地，擴大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影響。打從三十年代開始，左翼一直注重發展「進步評論」。戰後，南來的左翼文人影人不但攝製進步電影，同時積極開拓在報紙上的進步評論園地，吳詠恩的文章便勾勒出左翼評論對香港粵語電影的影響。三十年代粵語電影險遭禁絕，戰後以蔡楚生為代表的粵語電影評論，從方言的文化價值出發，對粵語電影加以肯定，使其日後發展成本土色彩濃厚的港產片。羅卡曾任《中國學生周報》編輯，他以過來人的身份縷述《學周》從創刊至停刊 22 年期間的變化。1952 年創刊時，正值韓戰後期，美國對中國大陸實行軍事、政治、經濟與文化圍堵。有明顯美援背景的《學周》在五、六十年代左右派交互文化統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引進西方現代電影思潮，從而衍生了七十年代香港的新電影文化，值得我們重新回顧。當年同樣接受美援的亞洲出版社，出版旗艦刊物《亞洲畫報》及學術著作、反共小說等書籍。一年後，主持人張國興成立亞洲影業，五年間拍了九部電影。容世誠將亞洲出版社和亞洲影業的出版事業和電影製作，置於同時代的香港歷史處境來分析，並將亞洲影業和電懋聯繫起來，使箇中的脈絡更清晰明朗地浮現出來。

在第四部分裡，作者將視點從大歷史移向個人的小故事。黃愛玲的文章從朱石麟和岳楓的電影人生出發，探討從事創作的人在特定的歷史環境裡如何自處，如何在種種客觀的條件局限中生存下去，並嘗試尋找自己的出路。朱石麟和岳楓二人背景相近，都在三十年代初投入電影界，上海租界淪陷時期皆留滬拍片，戰後南來香港，分別成為了冷戰年代左右兩個電影陣營的骨幹人物。同樣以兩位同年代但又分屬左右陣營的電影導演為個案，朱順慈從口述歷史出發，分析和比較王天林和胡小峰如何敘述他們的冷戰經驗，並初步探討口述歷史在電影研究中的優勢和局限。口述歷史雖然也可說是一種歷

史書寫，但敘事者選擇說甚麼內容，以及怎樣說，都隱含了當事人的主觀判斷和評價。如從這角度去閱讀口述歷史，可開拓更多詮釋歷史的可能性。鍾寶賢則獨挑張善琨來述說她的冷戰故事。張善琨在戰後一片「嚴懲漢奸」的呼嘯聲中南來香港，先後參與了永華、長城和新華的創業，並發起右派的自由總會，成為了台、港之間娛樂業和政治圈的橋樑。

第五部分是冷戰時期電影文本的討論。麥欣恩以六十年代電懋與日本東寶公司合作拍攝的「香港」系列作為討論對象，追溯冷戰在亞洲地緣政治及大眾文化所遺留下來的痕跡。「香港」系列共有三部電影，從1961到63年，每年製作一部，分別是《香港之夜》（1961）、《香港之星》（1962）、《香港·東京·夏威夷》（1963）。韓燕麗以倫理親情片為切入點，嘗試管窺主流香港電影由文藝片到歌舞片、武俠片、功夫片的轉變過程，從而探討戰後至六十年代末，香港電影如何在市場和政治的雙重壓力下，陷入政治失語的困局。六十年代，鐵金剛影片席捲全球，冷戰成為間諜歷險動作片的指定主題，香港影壇也出現了有趣的變奏。何思穎的文章分析了粵語片的「珍姐邦」和國語片的「亞洲鐵金剛」次類型，並回溯至戰後轟動一時的《天字第一號》（1946）。張建德則提出一種非傳統的觀點，指出《聊齋》鬼片具有冷戰寓意。研究對象，包括李翰祥改編自〈聶小倩〉的《倩女幽魂》（1960）、胡金銓改編自〈俠女〉的《俠女》（1970-71），以及徐克監製的〈聶小倩〉版本《倩女幽魂》（1987），都改編自蒲松齡的《聊齋誌異》。

附錄部分，收入三篇文章，分別是：影人座談會的討論紀錄；許敦樂有關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如何反映意識形態鬥爭的發言稿，許曾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以及由台灣學者左桂芳為香港電影資料館整理自由總會資料的工作報告，均具參考價值。在座談會的討論紀錄中，幾位代表左派陣營的講者，包括朱克、許敦樂、劉德生的發言甚值得注意，他們對左派的政治標籤很有保留，這種標籤對於釐清一些灰色地帶，並無幫助，這正好回應了本書前面幾篇文章所提到的問題。表面上是宿敵，其實暗地裡可以變成合作伙伴；這一刻大家還言笑晏晏，未幾卻又磨刀霍霍。政治、商業與文化，往往糾纏不清。

本書收錄的文章，除張濟順和左桂芳外，均源自文首所提及的研討會暨影人座談會。該研討會從2005年中開始籌備，得到香港大學中國研究策略研究專題（Strategic Research Theme on China Studies）和香港電影資料館提供研討會所需經費。當時參加籌備工作的，除編者二人外，還有何思穎、吳詠恩和容世誠。是次研討會能夠順利舉行，還有賴下列人士的支持，包括：朱克、吳俊雄、李小良、李元賢、李焯桃、汪朝光、黃紹倫、黃淑嫻、盛安琪、馮淑貞、焦雄屏、葉月瑜、葉漢明、葉嘉安、楊奎松、劉成漢、劉德生。

最後，要感謝本書各位作者，沒有他們的熱情參與，本書難以面世。

背景



長城總經理袁仰安與周恩來總理



我們在六十年代長大的人*

科大衛

我與電影之緣 很感激黃紹倫教授和李培德博士請我來，還要作主題演講。我很慚愧，因為我是一個不大看電影的人，不論現在或五十年代或七十年代的電影，我都沒有看過多少。最近幾年，因為我有興趣去寫香港的歷史，更煩惱於如何可以利用電影的資料。今天會議的題目是講電影，或者我應該先解釋的是，為甚麼沒有吸引我去多看一些本地電影呢？1966年是我大概二十歲的時候。在那個年頭以前，我們是被人帶去看電影的，並非由我們自己選擇去看。很老實說，大部分看的，並不是講左或右、有政治意識之類。我努力回憶，記得起來的是「唐僧取經」之類的東西，對豬八戒還有點印象。至於左派右派的那些就完全沒有甚麼印象了。我只是偶爾看一下粵語片，但覺得沉悶。到七十年代，到了我可以由自己選擇看電影的時候，我似乎沒有選擇各位所喜歡討論的那些影片。我看的主要還是西片，荷里活片也有。到進入大學的年齡，最喜歡的是比較新潮的法國電影如杜魯福之類。不知為甚麼香港拍的電影就不能吸引我們去看。到1967年，很多人說不要看左派電影。根據那時一些人的講法，您進去左派電影院也會遭殃。我沒有任何批評動機，我只是回憶自己的經歷。

* 編按：本文是科大衛教授於2006年10月27日研討會上所作的主题發言，由他個人經歷出發，講述他所處的年代、對冷戰時期的電影和香港左派、右派政治的看法。本文由馮潔馨抄錄，吳詠恩整理，李培德、黃愛玲校訂，最後經作者本人審閱。

六十年代的社會背景 或者要配合講一下，我們這一代人於當時做了些甚麼。我們那個年代，還有不少人是讀中文學校的。那時香港分英文學校和中文學校，中文學校除了英文科，全用中文上課，英文學校除了中文科，全用英文上課。不過，不要忘記，到了我們自己的孩子要讀書的時候，中文學校基本上已經停辦了。我們這一代很奇怪，即使是讀中文學校的那一群，當我們有小孩子，也不會讓他們去唸中文學校。但是，從我們這一代，開始聽粵語流行曲。大概到我進入大學的年齡，許冠傑的歌開始流行。過去常聽到人家談到時代曲，到我們可以選擇的年代，似乎時代曲也沒落了。

我們也是香港開始發達的那一代人，您看看數字便知道，從 1964 到 73 年，香港即使在工廠當工人的，薪水也高了百分之六十。其他行業，到了七十年代以後，發展得更快。回想，香港的五十年代，很多人都很窮，初到香港，大家都覺得生活成問題。但六十年代大家已經安定得多了，知道將來有前途。七十年代是香港經濟突飛猛進的時代，就是麥理浩任港督的年代，很多方面社會都在擴充，這是個背景。

說到冷戰，不錯，我們很多人都知道。怎樣知道呢？有一部分是來自家庭的長輩，不是靠左邊就是靠右邊的，有的贊成共產黨，有的贊成國民黨，這些名詞在家庭裡就會常聽到。我們同學之間，很少談論這些，但談起來也明白是甚麼回事。在這方面，香港的小孩子，政治敏感度較高。另一方面，冷戰是從報紙上看到的，因為報紙有左有右，整天也就是在冷戰。也有從日常生活知道的，因為商舖也有左派的，有些工會是右派的。如果您不知道有些工會是右派的，至少您也知道 1956 年有過暴動；暴動之後，香港警隊每年都會進行防暴演習，大家對這一回事都很有感覺。

但我又覺得，香港左派右派之爭，只屬小型冷戰。叫它作冷戰也可以，算是冷戰的邊緣，或邊緣的邊緣也可以。五十年代的冷戰，是在哪裡發生的呢？先在美國然後連帶西歐，蘇聯在中間。那個冷戰是從韓戰開始的，從那個時代開始，冷戰說的是韓國、古巴、匈牙利，跟著是越南、捷克，有時冷戰進行期間會忽然變熱的。

這個大的冷戰環境，跟香港的歷史有很大關係，與我們在報紙和其他媒體上看到的小型冷戰不同。在 1949 年，香港不那麼清楚殖民地的地位能否繼續維持，只有到了韓戰爆發的那一年，英國才表明不會把香港交給台灣或北京任何一方。香港政府處於冷戰時代，要應付的並不是左還是右，相反是如何能令英國政府願意繼續留在香港。這一問題是我們從報紙上閱讀不到的，日後我們到英國的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才有所證實。柏立基是最支持冷戰這回事的香港總督，他對中國大陸和台灣在香港的勢力都很敏感，但

他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是1962年到英國，要求英國政府拿出二百萬鎊來，作為救濟香港的一點表示，好讓香港人覺得英國並無離開的打算。大家可能覺得他有點天真，但檔案上確實是這樣寫的。當時英國政府鬧窮，那二百萬鎊算是很大的數目，當然拿不出來。但是，英國外交部有些很聰明的人想到，現在當「難民年」，香港反正有很多難民，倒不如把香港捧出來，讓聯合國來救濟。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冷戰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香港政府其實是相當了解左派右派的這場鬥爭，基本上右派是輸了，轉移到台灣去，搞不起「熱」來。左派也不會熱到哪裡去，因為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英國政府已洞悉北京不打算對香港做任何事情。所以這一場仗，在香港只是言論上的冷戰，不必擔心會有甚麼危險。政治上，我們大家都把目光投到媒體上的言論冷戰，香港政府要做的工作其實簡單不過，因為香港沒有了香港政府要應付的那種政治，當時香港處於所謂政治「高熱」年代，只是左派右派在報章上您罵罵我，我罵罵您，傷不了任何人，並沒有人在講「其實我們香港市民需要多些民主」。大家不要忘記，目前我們已經不再考慮這一問題，但於五、六十年代，大家是很認真的。如您非香港出生，就有被遞解出境的可能，有很多人每天都要面臨這個危機。所以，也不是很多人敢為政治去做很多事情。

在這種冷戰氛圍下，結果香港變成對政治相當冷漠，我們要表達政治意見便得通過別的管道。但您不要去想，小冷戰只是因為感情用事。到目前為止，香港左派機構的歷史寫得太少。其實我們要了解香港的歷史，很需要多知道一些有關本地左派的組織。這樣說實在有點不好意思，我認為現在還不動手的話，也沒有多少年可以讓您去等了。其實這個問題應是過去式，是上一代的問題。今天已沒有冷戰，如再不去討論，那一班知情的老人家到了九十歲，還可以勉強去做訪問，再過一點時間也沒有多少人能告訴您很多事情了。這裡存在一個困難，這是我們很急需解決的事。既然我們對左派的歷史所知不多，有很大部分只是一些蛛絲馬跡、謠傳，不如大家去想想辦法，將左派歷史寫出來，反而比較實際。

香港左派 甚麼是左派？您要明白中國大陸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香港需要的資源，不論食物或建築用料，大部分是由中國大陸運來的，所以在冷戰中支持左派的，並非一定是贊成左派思想的人，這是當然的事情。有這麼大的經濟利益存在，背後支撐的基本上是一個財團、一個勢力，可以把經濟的資源提昇到國家政治層面。甚麼是右派？既然左派能講共產主義，右派就可以講中國文化，而我們香港這個政府最擔心的事就是牽涉到文化。英國人覺得自己是從海上來的，可以置之度外。一些敏感的問題，我們的歷史課本是

不討論的，平時香港政府用不著牽涉進去，您們中國人說甚麼中國文化，不關他們的事，您喜歡說甚麼就說甚麼。但是學校的歷史課本就不同了，政府設有一個教育署的委員會在監管著。基本上在 1956 年之前，政府怕右派機構，但 1956 年之後就不怕右派的思想，因為右派捧出來的只是中國文化。既然右派的思想是利用中國文化來作宣傳，背後有沒有經濟因素呢？當然有，不過都是您跟我所不會知道的，但也偶爾會露出一點蛛絲馬跡來。後來您就會發現，原來某雜誌於某一個時候出現，某一個時候結束，都因為台灣資助問題。有時我們會揣測，一些右派宣傳品跟台灣資源有密切關係，台灣的資源又與美國的資源有關。所以，香港是冷戰的邊緣下的邊緣。

在以上所有的問題上，我們不能說冷戰無關重要，但也不能說是香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我認為對於 1967 年的歷史，基本上我們還沒有開始去寫，我揣測 1967 年之前，左派在香港有相當完善的機構，但六七暴動使香港左派機構自己成為最大的受害者。第一，他們失掉了香港民心。第二，因為中國內地鬧文革，香港的左派機構自己都不清楚有沒有正統性，變成左派機構本身也很難運作。第三，香港政府到了 1967、68 年，便慢慢搞清楚原來香港的左派機構並非由北京支持，香港政府就敢去對付他們了。當香港政府真要對付左派機構的時候，左派的陣腳就大亂了。

1967 年之後，如您找出我們已有的七十年代資料，便知道左派失去了完整的體制。一直到八十年代，就是到中英談判之後，中國才開始重整香港左派機構的制度。因此，在 1967 年之後，局面是有變的。但是，您說哪一方面，如何影響，尤其是亂了的局勢，我們就難以看得清楚了，我們很需要掌握多一點這一方面的資料。

香港文化和電影 如果要討論六十年代香港人的思想背景、經濟背景和冷戰背景，我還想一提，我們六十年代成長的這一群人，有沒有文化呢？因為一提到電影，我相信您就會馬上聯想到一樣叫文化的東西。

電影與這些東西不同，很特殊的，例如相對於一本書來說，電影有很大的吸引力。看書至少要慢慢逐字逐句去看，花技巧地去看，但是電影連翻都不用翻，更加不用識字，坐在戲院涼著冷氣就可以看，看得很舒服。不過，電影也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尤其是如果您要用廣東話去拍一齣電影，電影便需要聽得明白這個語言的觀眾。香港的廣東話文化，對電影來說很吃虧，甚至現在的報章用廣東話來寫文章也很吃虧，因為結果只會把您局限於懂廣東話的那一群對象，吸引不到外界。除了廣東話的讀者，您有何其他出路呢？如您進不了中國大陸的話，基本上只有香港的七百萬。六十年代香港沒有